

## 社会失控: 民国时期敦煌地区鸦片烟毒问题述论

尚季芳 张承鹏

(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兰州旅游职业学校,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民国时期, 地处西北的甘肃毒品泛滥, 肆虐非常。僻处甘肃西部的敦煌也不例外, 境内罂花遍野。大面积的毒品种植, 挤占了粮田面积, 粮食总产减少; 农村手工副业受到摧残, 农家收入顿减; 众多吸食者的存在, 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 土地耕作不足。这些都给农村经济沉重打击, 农民离村现象严重。敦煌地区毒品泛滥的原因除政府征收烟亩罚款、地方交通不便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因素外, 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权威的缺失, 地方实力派的坐大, 社会失控现象严重, 使得禁政推行极其繁难。

关键词: 社会失控; 民国; 敦煌; 毒品

中图分类号: K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8)03-0051-06

## The Social out of Control: On the Opium in the Dunhuang Are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 Ji-fang ZHANG Cheng-peng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Gansu Province drug being in flood. Gansu's Dunhuang is not exceptional, within the boundaries the small-mouthed jar flower spreads wildly. The planter narcotics, occupied the grain field area, the grain total output reduced, the peasant family livelihood is greatly affected; Rural area handwork subsidiary business is destroyed, the peasant family income cuts; A lot of the existence taking in person, the spall lost the social most basic productive forces, the land cultivation insufficiency. These all give the rural economy serious attack, the farmer leaves the village phenomenon to be serious. The cause being in flood collects Dunhuang area drug except the government besides cigarette imposes a fine of mu, the place has poor transport facilities waiting for a factor backward with health and medical community condition, the basic reason lies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authority's flaw, the place real power faction's seat in a big way, the social out of control phenomenon is serious, enables to endure the politics to carry out extremely troublesome.

Key words the social out of control;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Dunhuang; drag

## 一、敦煌地区鸦片种植情况

民国时期, 甘肃省毒品泛滥, 依靠鸦片税收和贩卖所带来的利润是甘肃省财政的主要财政来源。敦煌地处党河岸边, 土地肥沃, 是甘肃河西地区的主要鸦片产区之一, “其闻名于世并不仅仅因为千佛洞, 还因为是有名的罂粟种植地”。<sup>[1]</sup>当时凡到过这里的人, 都对此有真切记载。清末民初,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看到敦煌“主要种植小麦、豌豆、小米、糜子、油料作物和鸦片(种植罂粟占全部耕

地的三分之一)”,<sup>[2]</sup>而鸦片产值是敦煌地区的一大财政支柱。

民国伊始, 张广建督甘, 对禁烟比较重视, 甘肃境内的鸦片种植一度禁绝。1921年, 江苏人陆洪涛督甘, 此时的甘肃已经分崩离析, 甘肃八大镇守使拥兵自重, 割据称雄, 陆只是名义上的督军而已。财政上, 各镇守使自恃武力, 款项大多截留。面对竭绝的财政, 陆洪涛开放烟禁, 征收烟亩罚款。针对陆的倒行逆施, 时人作诗予以抨击: “民国新悬五色旗, 十年甘局苦撑持, 乘槎喜见神仙使, 无

本文系甘肃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年《社会失控: 民国时期甘肃禁毒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8-03-25

作者简介: 尚季芳 (1976-), 男, 甘肃张家川人,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西北开发史和中国近现代区域史研究。

张承鹏 (1975-), 男, 甘肃兰州人, 兰州旅游职业学校教师, 主要从事区域旅游研究。

米难教妇女炊,法纲森严三面启,人声附和万波随,芙蓉莫把东风怨,满地烟花会有期。”一些开明的地方人士也极力反对,敦煌县长杨巨川就是一例。他上书力陈此为祸国殃民之事,遗患无穷,然“非但无效,且给敦煌摊派烟款巨万,道署派员坐催甚急,县署不堪扰,小民不堪命”。杨在拒之乏力的情况下,愤然辞职。在返回兰州途经布隆吉尔(今安西县境)时,心中苦闷不已,遂于店壁赋诗一首,借以舒怀,诗云:“只重金钱不爱民,黑心符出影留真。水云荡煞罌花界,误尽苍生是此人。”<sup>[9]</sup>愤慨之情,跃然纸上。

1925年,冯玉祥入主甘肃。冯当时碍于实力单薄,难以在各地地方实力派中站稳脚跟,且为了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大肆在西北扩兵备战,军队数量猛增。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冯玉祥瞅准了鸦片的巨额利润,迫使农民种烟,征收烟亩罚款。从此,整个甘肃包括敦煌鸦片种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1929年,当冯玉祥的势力逐步撤出甘肃之时,敦煌地区相继被马仲英和马步芳占据,一时你争我斗,地方政局混乱不堪。各自都围绕着鸦片利益展开了角逐,鸦片种植面积未有稍减。1933年8月,行经此地明驼看到:“沿党河西岸上溯,很过了几道水渠,穿过许多树林和庄园——麦子、鸦片烟、高粱、瓜、种得很不少——走了二十里地,都是一样的光景。”<sup>[10]</sup>1935年6月,陪同邵元冲的考察西北的陈赓雅又写道:“渡党河西行,沿途沟壑纵横,村树茂密,禾麦之属,欣欣向荣,罌花美艳,尤为可观。”<sup>[11]</sup>

敦煌鸦片种植的面积,由于每年数字不一,无法一一列举。1934年据甘肃省民政厅档案记载,种植面积6133亩,产量184000两。<sup>[7]</sup>位居当年河西各

县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第六位。就当时敦煌地区可耕种土地面积较少的现状而论,这一种植亩数是相当大的。<sup>[6]</sup>

敦煌地区的鸦片收获后,除大部分供本地居民消费外,一部分运往外地销售。向西运往乌鲁木齐,价格不菲,“在敦煌每两烟土价一元大洋,运到哈密便可售四元大洋”。<sup>[8]</sup>曾在敦煌县任过职的宋荣也回忆道:“按当时的行情,6斤60两,据说运到乌鲁木齐可卖150两,运到和田可卖到250两。”<sup>[9]</sup>利润十分优厚。向东通过驼帮运往包头,再转运京、津一带。向东南运往肃州、兰州等地。

依靠着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某种“繁荣”。由于鸦片质轻价高,极易携带,运往新疆销路很快,所以敦煌民众蜂拥进疆销售,“他们返敦时又购买苏联商人运往新疆的各种布匹,西洋日用杂货或新疆土特产品到敦煌设铺摆摊出售。一时,敦煌市面商品流通,经济活跃,农民手头稍事宽裕”。<sup>[10]</sup>

## 二、鸦片与敦煌农村经济之衰落

鸦片虽说给敦煌地方经济带了某种“繁荣”,但这种繁荣是畸形的,种植鸦片带给地方社会更多的是灾难。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甘肃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农村经济一度萧条不振。当此时,农民尽力躬耕于土地,所生产粮食都时有不虞,然而大面积的鸦片种植,无疑给这种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首先,鸦片的种植挤占了粮田面积,粮食价格上涨。种植鸦片需要充足的水源,上好的土地,如其不然则收获不丰。范长江看到敦煌“好地尽种了烟土”,以致“每年粮食不足,春荒时流亡遍野”。<sup>[11]</sup>当地粮食价格飞速上涨,看下面敦煌县的粮价变

1911年—1934年敦煌县粮食价格变迁情况<sup>[12]</sup>

	大麦			小麦		
	最高	最低	普通	最高	最低	普通
民国元年	3.5	2	3	1.9	1	1.6
民国二年至八年平均	4	3	3.5	3	1.5	2
民国九年至十三年平均	4	3	3.5	3	1.5	2
民国十四年	4.1	3.2	4	3	1	2
民国十五年	21	19	20	11	8	10
民国十六年	21	19	20	10	7	9
民国十七年	12	9	10.5	10	7	9
民国十八年	13	10	12	12	10	11
民国十九年	13	10	12	22	19	17
民国二十年	23	17	20	22	19	17
民国二十一年	23	17	20	22	19	17

迁表。

依据上表,从1911年至1932年,敦煌县的小麦和大麦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大麦的普通价格由3元涨到20元,最高价达到23元,最低价也为17元;小麦的普通价格由1.6元涨到17元,最高价格为22元,最低价为19元。粮食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频繁的天灾,影响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鸦片的种植难逃其咎。上表1925年和1926年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1925年大麦普通价格为4元,次年急剧上涨到20元,上涨了5倍。该时期小麦也有2元上涨到10元,上涨了5倍。考其根由,此时冯玉祥的大军涌入西北,军粮供应浩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刺激了粮价的上涨;同时,为了筹措军费,鸦片大面积种植,挤占了良田面积,粮食的总产量减少,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粮价因之飙升。

其次,种植鸦片还打击了农村手工业的正常运行。河西“大抵西部肃州一带,即酒泉附近之高台、鼎新、敦煌诸县,产棉较多,旧日妇女多以织布纺线为主要手工业,近年因播种大烟,棉田被侵,土布销路又为俄国棉布所侵夺,殊为可惜”。<sup>[13]</sup>不惟纺织织布业大受影响,其它各种副业皆受重大打击,如当地颇为发达的淘金业进入民国以来,衰颓不堪,“盖人民多趋于种烟一途也”。<sup>[14]</sup>副业是农家获取货币的主要途径,然而种植鸦片将正当的副业扼杀,农家获取货币的一大来源断绝。虽说鸦片交换能给农家带来些微货币,但这个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利益被地方驻军所窃据。

再次,众多吸食者的存在,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死寂,毫无生气。时人记载道:“敦煌周围的地土肥美,……可惜居民多吸鸦片。”<sup>[15]</sup>在县城“最热闹的东关什子街上走,很能找到几个排着小菜摊的小商人,他们一面做着买卖,一面却找空躺在摊子旁边抽大烟”。<sup>[16]</sup>县政府所在地如此,广大乡里社会不难想象,更是烟民遍地。鸦片烟的毒害,致使吸食者身体孱弱,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当地的汉人,无论穷富老少、种田人、商人和手工匠,只要鸦片烟枪在手,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因此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sup>[17]</sup>显然,这种情况使生产者减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影响农村经济匪浅。同时吸食鸦片将民风苍劲、尚武好勇的河西民气消耗殆尽。敦煌“街上毫无生气,除了一两个衰弱的吸毒者和一群街上的顽童外,看不到别的。”<sup>[18]</sup>这种死气沉沉局面,与当地民众吸食鸦片不无关系,时人称之为“精神被鸦片烟蛀霉了”。<sup>[19]</sup>

总之,鸦片的种植使农村经济备受打击,原有的农村生态体系已经很难维持民众的生存,他们只有离村出走,要么逃往城市谋生,要么移往别处开垦糊口,有一些还加入社会次生群体的行列,选择当兵或当土匪。敦煌县的农民这三者兼而有之,但以移民别处居多。移往新疆者“近五年络绎不绝”。<sup>[20]</sup>有鉴于此,敦煌县长王会文1942年5月急呈省府,指出各乡农民逃亡严重,“计鸣沙镇逃亡男十一口,女十二口,和平乡逃亡男二十六口,女十口,新安乡逃亡男十八口,女二十一口,永宁乡逃亡男七口,女三口,静肃乡逃亡男二十口,女八口,总计本县共逃男七十四口,女五十四口”,<sup>[21]</sup>请求省府设法拨款救济。然而省府也无能为力,只能任其逃亡。流民充载于途,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抛荒,无人耕种,地价下跌。敦煌县民国初年全县共有土地117195亩,到1934年荒芜土地2812亩;地价1911年上等地的价格为45元,而1934年为15元,<sup>[22]</sup>下跌趋势至为明显。以上事实表明,鸦片的种植和吸食给敦煌地区的社会正常有序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给原本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 三、敦煌地区鸦片种植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敦煌地区种植鸦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依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沉重的烟亩罚款是民众种植鸦片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河西地区军队林立,军费众多,军费依靠烟亩罚款挹注。该罚款起初按种烟亩数征收,但后来不管种与不种,一律按田亩摊派,每年政府根据财政收入多寡,确定数目,直接由军队下乡提取。毫无疑问,沉重的军费分担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以敦煌县南湖村为例,该村共有居民60余家,500多人,仅24家有支付能力,其余有些户无土地,有些户被抓去当壮丁。下表反映的是该村1932年的负担情况。

分析上表,除本色粮、折色草价、指粮借价、金库券不是军费外,其余均为军费、军用支出,占总支出的80%。在军费中,禁烟罚金(烟亩罚款)是最重的一项,达2300元。此外驻军还征收1800两的军用烟土,即“官土”。所谓“官土”,按范长江的说法,即官家所要之烟土,官家虽然打着收买的幌子,其实并不是自由交易性质,而是强迫低价收购,农民所得利益甚少。<sup>[23]</sup>上表只反映的是一个村庄的款项,揆之敦煌全县,数目当更大。如1934年,敦煌全县分摊烟亩罚款40000元。<sup>[24]</sup>不管是征收烟亩罚款,还是征收“官土”,都表明民众除了选择



1932年敦煌县南湖村负担表

项目	价值	项目	价值	项目	价值
36 师军马 9 匹	360	军粮棉花洋铁	280	本色粮 64 石	1560
差车死过牛 16 只	500	征兵价补官价	1040	折色草价	358
来往军队用羊 235 只	400	烟土(军用)1800 两	1260	指粮借价	120
粮秣供应 56 石	1500	军用牛羊皮	153	金库券	320
军装费	717	军用品人情杂项	820	种烟罚金	2300
共 计	12688(以上以元为单位)				

注:该表共计数字实为 11688。

种植鸦片之外,别无他途。难怪有人说:“老百姓在‘饭可以不吃,款不可不缴’的情况中,只能种几亩鸦片烟来应付款项,而没有出产鸦片烟的人家,那就倒霉,非借债便卖身、卖物以相偿。”<sup>[29]</sup>

第二,从短期的经济效益来看,鸦片相比农作物有较优厚的利润,在缴纳完政府的赋税之后,还略有剩余,这又是吸引农民种烟的重要因素。陈赓雅见景泰县达拉牌地方农民在砂田上种植罂粟,问其种烟原因,“据谈:‘初纳税自六十元,今涨至百元,年收烟土五百两,可值二百五十元,易而种麦,可收四石,仅值一百六十元,税率仍如上数。故一般农人,甚愿舍麦种烟’”。<sup>[29]</sup>此虽非敦煌的例证,但敦煌与其相似。时人宋荣的回忆也可证明之,“过去农民只种粮食。作务一年到头,除殷实之家外,一般农户家庭妇孺衣换不过季者比比皆是。自种烟后,她(他)们大小都能收集些卵浆、淡渣浆,有达数十两者。她(他)们把收获的烟土出售后,所得款项一般都可自由支配,或买喜爱的衣料,或买鞋、袜等用品。这些在那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不无小补。”<sup>[27]</sup>可见,依靠鸦片获取的利润,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家购买部分日用品的需要。这种短期的经济收益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刺激了他们的种植欲望。

第三,从当时整个甘肃社会的交通滞后情况来看,鸦片相较粮食作物便于运输。交通不便致使正常的经济发展受阻,给偏僻之地种烟提供了地理空间,也为政府查禁带来了困难。敦煌地区的运输工具大多依靠传统的马车和大车,人背肩挑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运输方式仅靠“公路”运营,但时常风沙弥漫,土匪劫道。常书鸿写道:“由于军阀割据,战乱灾祸频仍,加上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真是比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去还困难啊!”<sup>[28]</sup>如此严酷的交通现状,即使有剩余农产品,也不便外运。因此对于“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

者”<sup>[29]</sup>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根据供求和成本以及收益来抉择自己的生产。他们更愿意选择质轻价高的鸦片。

第四,鸦片的种植还与当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有关。民国时期,甘肃省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1935年,政府开始主办医疗卫生事业,1940年敦煌县才设立卫生院,治疗简单的妇婴卫生和防治天花麻疹等传染疾病。对于幅员辽阔的敦煌地区来说,此区区卫生院只能满足极少数患病群体,绝大多数人由于难以承担高额的药费均止步不前。由此遂将治愈疾病寄托在吸食鸦片上。据医学资料,鸦片对胃病、痢疾、大肠炎、肺炎、感冒、咳嗽、气喘、淋病、牙痛、癫痫、劳累和失眠等症状有一定的疗效和抑制作用。对于缺医少药,又广泛种植鸦片的乡土社会来说,鸦片自然成了聊以止痛的药品。

总之,敦煌地区民众种植鸦片有着多重因素,它既是政府财政不足,依靠鸦片挹注军费的主要手段;又是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下,农民不得已的选择。

#### 四、社会失控与敦煌地区的禁政

民国时期,甘肃省历届政府都对禁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张广建督甘时,禁烟成效较大。慕寿祺赞扬道:“甘肃自张督军任职以来,认真禁烟,今已七年矣,各县业经禁绝,民间虽有存土,究亦无多,遂致烟加腾贵。”<sup>[30]</sup>由于种植的减少,吸食和贩运相应的受到了限制,甘肃“几成净土”。后继者陆洪涛、刘郁芬等虽高喊禁烟口号,但实质上不仅未能实施禁政,反而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民间烟土的种植、贩运和吸食肆行猖狂。1928年,国民政府宣称建立,但其统治地区有限,甘肃名义上纳入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内,但实权仍掌握在冯玉祥国民军手中。1929年,为逐鹿中原,国民军逐步退出甘肃政坛,此时甘肃出现了权力真空,隐

忍多时的西北回族军阀乘时而动,号称“尕司令”的马仲英在马麒、马麟等的支持下宣布起义,攻占河西。烟亩罚款成了其搜刮民财的重要来源。敦煌地当东西孔道,马仲英来此征兵、征粮、要款层出不穷。1933年1月17日,“三十六师马仲杰(马仲英部下)团长来敦筹款,同日禁烟善后局局长马永禄要办坐销(存土即不卖亦上税,谓之坐销)。”<sup>[31]</sup>20日,“三十六师马仲杰旅长要地方代购烟土十万两(从前之三万两不算),定价四十六元(时价六十元上下),再三求减,结果办足六万两。”<sup>[32]</sup>4月15日,“三十六师马旅长仲杰开走哈密,二十八日马禁烟善后局局长永禄提手枪威胁各区区长要坐销款。”<sup>[31]</sup>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邵力子对此愤恨不已,下令地方驻军停止乱派亩款,但在地方军事势力的夹击下,施政乏术,愤然辞职。1933年5月,军人出身的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中央政权相对稳固,对甘肃的控御力逐步增强。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拟在1935—1940年将国内毒品全部禁绝。甘肃省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执行此计划,决定分五期禁绝境内毒品,敦煌属第五期禁绝县份,即在1939年禁绝境内所有的售、运、贩、吸诸事宜。

“六年禁烟”计划时期敦煌的禁政效果如何呢?在禁种上,成绩最大,截至1940年,敦煌境内除在南山一代哈萨克族居住区内有少数烟苗发现外,其余地区烟苗基本绝迹。然而在运、售、吸方面则成效不大。如在吸食上,敦煌登记烟民2379人,但到1940年6月戒绝者只有735人,未戒绝者1644人,未戒者占烟民总数的69%。<sup>[32]</sup>众多的“瘾君子”还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

敦煌禁政出现如此效果,不是偶然的,它与马家军阀对甘肃禁政的掣肘有密切的关系。1933年,当马仲英的势力退出敦煌之时,马步芳的第九师遂占据了敦煌的统治权。直至1940年代末,马家军阀在此地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甘肃省名义上管辖该地区,但无绝对支配力量,“最好的场合,不过办到面子上的敷衍而已”。<sup>[33]</sup>派往各县的县长,必须征得马家军阀的同意。

面对鸦片的厚利,驻军趋之若鹜,对甘肃省推行的禁政置若罔闻,处处抗衡。曾在此地查禁种烟的甘肃省禁烟督查团第四组组长戴建标对此深感懊恼。他分析道:“烟土在军阀时代,为军阀敛钱之泉源,故特殊情形地方之禁政,其废弛状态,可以不言而喻。”此语点中要害,正因为马家军阀

将此作为敛钱的泉源,其就不可能支持甘肃省政府的禁毒政策。此地为官者常受其要挟,执行禁政法令时,不得不听命于特殊势力。戴建标气愤地指出:“最堪嫉首痛心者,即负有禁政责任之各级县政人员,为迎合特殊情形之环境,以一切禁政法令,置诸不理,甚有多数不肖县政人员,藉口特殊情形,亦从中渔利,是以河西禁政,益不堪闻问。”<sup>[34]</sup>诚然,县政听命于特殊势力,的确让人痛心疾首,甚至从中渔利,更不可饶恕,但揆之当时具体的特殊地域和特殊势力,对马家军阀中央政权也莫可奈何,何况一小小县长。在此情势下,河西的禁政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戴建标声言该地“除禁种已无问题外,对于禁运、禁售、禁吸,要办理彻底,均成问题。”<sup>[35]</sup>可见,六年禁烟计划时期,敦煌地区禁烟成效除禁种外,其余均效果不彰。

1940年代,随着本地烟土来源断绝,外来烟土数量的减少,敦煌地区的运、售、吸逐步被遏止。但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随着政权的式微,敦煌地区的毒品有卷土重来之势。1947年,在红柳沟内,发现哈民种植烟苗,“长达四五十里”。<sup>[36]</sup>此时国民政府已朝不保夕,无力控御毒品的蔓延,直到共产党执掌政权后,才将毒品彻底禁绝,结束了近百年毒害敦煌人民的烟祸。

敦煌地区毒品的泛滥是甘肃省的一个缩影,其所带来的危害不可估量。追究其根由,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北,尤其在马家军阀统治范围内中央政府权威的缺失,使地方实力派得以坐大。他们以“青海王”、“土皇帝”自居,利用鸦片大发其财,极尽搜刮剥削之能事。30年代,蒋介石派实力派人物朱绍良两次主政甘肃,妄图通过甘肃这根打进西北的楔子,“遥控新藏,近制青宁”。<sup>[37]</sup>但朱绍良也无能为力。时任财政厅长的朱镜宙回忆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上午,朱主席告诉我:河西有私贩鸦片情事,已被军队捉住;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禁烟局不必管。河西是产烟最多的地区,如果真的贩运被捉,那,必定与当地军部有关,禁烟局是个纸老虎,管管小百姓,倒还有些威风;若要管军部,那一定要出洋相,主席似乎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命我不必管。”<sup>[38]</sup>显然,河西地区的鸦片贩运集团就是马家军阀。诚如有人指出的,“省政府虽然一直试图实行一项禁绝鸦片的政策。可是,鸦片交易主要操纵在到处都存在而且非常有势力的秘密社团手里”。<sup>[39]</sup>省政府对河西的贩烟莫可奈何,听之任之。

诚然,河西敦煌地区的鸦片烟毒在无政府状态下蔓延不已,也是国民政府在全国禁毒不力的

主要表现。国民政府与烟毒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禁绝烟毒的态度暧昧。再加上国内外纷乱的局势和财政上的入不敷出,禁绝烟毒自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到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之时,中国的烟毒始终未能彻底涤荡,成为来日新政权去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 注释:

前五位依次是武威83333亩,张掖46666亩,永登26666亩,古浪16133亩,酒泉9016亩。

#### 参考文献:

- [1][9][日]吉川小一郎.敦煌见闻[Z].章莹,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89.289.
- [2][18]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古日记[Z].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349.348.
- [3]劫余生.禁烟竹枝词·其二·陆督驰烟禁[N].甘肃民国日报,1947-6-3.
- [4]言微.杨巨川在敦煌[A]//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陇原鸿迹[C].上海:上海书店,1994:36.
- [5][16][19][25]明驼.河西见闻记[M].达浚,张科,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98.110.110.107.
- [6][12][22]高良佐.西北随轺记[M].雷恩海,姜朝晖,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175.152.160-151.
- [7]甘肃省种烟亩数及产烟额统计表,甘肃省民政厅档案,档号15-15-11.31-32.
- [8][10][27]宋荣.鸦片毒害敦煌之见闻[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敦煌市委员会编:敦煌文史资料选辑[C].第2辑,1991:12,210.
- [11][2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52.138-139.
- [13][33]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A]//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合作出版,1977:26440-26441.26461-26462.
- [14][20][26]陈康雅.西北视察记[M].甄嗽,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93.194.123.
- [15]季理斐意译,金文祺译:西北边荒布道记[Z].台北:文海出版社,1931:43.
- [17]天涯游子.人在天涯[Z].杨镰,整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71.
- [21]为呈报本县户民逃亡情形祈鉴核备查由[Z].档号15-9-86.
- [24]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择要报告[R].甘肃省图书馆藏,1936:31-32.

[28]常书鸿.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丁当——我在敦煌四十年[Z].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1:5.

[29][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5.

[30]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第30卷)[M].兰州: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16.

[31]吕鍾总纂.重修敦煌县志(五),写本[M].甘肃省图书馆藏,1946:50-51.

[32]甘肃民政报告,油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藏,1940.

[34]甘肃省禁烟督察团第四组督察河西各县局禁政工作总报告书,档号15-8-404.

[35]第四组组长戴建标报告[R].档号15-8-399.

[36]红花长达数十里,敦煌哈民种大烟,山路行劫抢夺大批民羊[N].和平日报,1947-10-02.

[37]仁.希望于朱绍良主席者[J].西北春秋,1933,(2).

[38]朱镜宙.梦痕记(下)[A]//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第426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363.

[39][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R].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0.

[责任编辑 张科]

[责任校对 周振兴]